

新人文

XINRENWENYUYANWENXUEYANJIUCHONGSHU

语言文学研究丛书 ● 张鸿声 主编

传承与反叛

——中国文学现代转型研究

黄轶 著

河南人民出版社

新人文

语言文学研究丛书 ● 中国文学研究

传承与反叛

——中国文学现代转型研究

王德威

著

王德威

著

著

著

著

著

著

著

著

著

著

著

著

著

著

著

著

著

著

著

著

著

著

著

著

著

著

著

著

著

著

著

著

著

本书出版得到“河南省社科联成果出版资助基金”资助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传承与反判/黄轶著. - 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
2008.3

(新人文:语言文学研究丛书/张鸿声主编)

ISBN 978-7-215-06174-3

I. 传… II. 黄… III. 文学史—研究—中国—20世纪
IV. I209.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88449 号

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郑州市经五路 66 号 邮政编码:450002 电话:65723341)

新华书店经销 河南龙华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 毫米×1240 毫米 1/32 印张 11.25

字数 300 千字

2008 年 3 月第 1 版 200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26.00 元

前 言

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走过了一个世纪的探索之路迄未完成,至今为止关于中国文学现代化问题的探索也还并未全面展开。现代文学的早期萌芽应该追溯到 19 世纪末到整个 20 世纪,正如我在另一部书稿中所说的,那时中国的思想文化界急剧变动的态势用“狂飙猛进”来形容可能最为恰切,异邦新知新观的传入与本土传统的交锋,本土传统在自身演进过程中所产生的裂变与重组,使一代代知识分子的宇宙观、社会观、生命观在潮起潮落中跌宕,新的人格理想的建构面临着转型期的各种困惑,新的文艺观也便在矛盾纠葛中酝酿萌生。这里我们以文学翻译为例来探讨西方文化怎么成为建构现代文学的参与者。中国翻译外国文学的高潮在晚清兴起。1862 年,清廷开设了同文馆,这是近代中国培育外交翻译官员和使领馆官员的第一所外语翻译学校。那些从新式学堂毕业而外语又比较好的人,曾自觉不自觉地从事过翻译活动,如从事文学翻译的魏易、曾宗巩、蒋绍徽、曾朴、周桂笙、包天笑等,慢慢自费出国留学也成为风气,据有关方面的资料记载,到 1905 年,仅留日学生就达 8 000 多人,到 1906 年又陡增至 12 000 人。这些留学生回国后很快成为翻译文学的骨干力量,像严复、马君武、苏曼殊、辜鸿铭、伍光建、徐念慈、陈景韩、应时、周树人(鲁迅)、周作人、陈独秀、胡适、李石曾、郭沫若等,都有过留学背景,所以现代文学的建构和这些人的留学背景息息相

关。

在晚清,因为当时的宣传导向认为“文学有移风易俗之社会功效”,外国文学被大量译介到中国,从1890年到1919年这30年,是迄今为止译介外国文学最旺盛的时期。在输入西方文化的过程中,有两本书对中国新的文化结构的生成影响最大,一本是严复的《天演论》,一本是林纾的《巴黎茶花女遗事》。严复作为当时的三大翻译家之一,曾译入“八大社会科学”名著,《天演论》的影响空前绝后。古代中国传统文化的宇宙观、历史观和时间观主要是循环论的,所谓“大道周天”、“无往而不复”等。在1898年《天演论》翻译进来以后,人们猛然意识到对于国家或者对于个人来说,时间永远是线性地向前发展,不可能重复。进化论将价值和意义注入时间,随着时间不断向前的线性运动,价值和意义也就越巨大,更高级的、更美好的、更有价值乃至更具有神圣性的东西都在时间的现在,更在时间的前方维度。不管这种理念在21世纪的今天有多少地方需要重新反思,但在19世纪末内外交困的窘境下,中国人不得不接受西方那本源于基督教但又被科学、理性、进化论等“现代性”改造过的时间观,“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观念使得中国人第一次有了巨大的被世界的进化链条淘汰出局的危机感。

1899年林纾以“冷红生”为笔名翻译了法国作家小仲马的《巴黎茶花女遗事》,由素隐书屋出版。这是中国输入的第一部欧洲文学名著,其成功之局面可以通过严复的“可怜一卷《茶花女》,断尽支那荡子肠”略知一斑。归纳起来,这部译书带给中国文学界的影响至少有以下几点:第一,以往中国文人认为外国只有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书籍,没有《红楼梦》般优秀的杰作,《茶花女》传入,征服并纠正了中国读者的偏见,使之恍然大悟,“原来西方也有如此伟大的文学作品”;第二,通过《茶花女》等译作,西洋小说的第一人称叙事、书信、穿插、倒叙等创作技巧和艺术手法以及悲剧叙事的文体格局等输入中国,给中国文学界以启发;第三,《茶花女》这部通俗爱情读本通

过揭示玛格丽特这一女性形象的人生悲剧,对虚伪的道德观念进行了抗议,表达了对于纯真爱情的追求,让中国当时仍然被传统道德囚禁的知识青年受到极大的心灵震撼。《茶花女》在掀起一个译介西方文学作品的高潮的同时,也极大地影响了当时一个时代的中国作家的创作,出现了许多抗议当时中国社会的权势人物、封建婚姻制度和道德观念摧残年轻人美好情感的小说。如钟心青的《新茶花》通过描写名妓武林林与项庆如的真诚感情遭到京中要员王尚书破坏的悲剧,揭露了封建恶势力的狰狞无道;徐枕亚在《玉梨魂》一书中即自比为“东方仲马”,他对《茶花女》爱情思想极大的认同是不言而喻的,《玉梨魂》有史以来第一次正面涉及寡妇恋爱的问题,催生了20世纪中国第一个通俗文学流派——鸳鸯蝴蝶派。虽然以上论述也许是某种以偏概全,但从中可看出西方文学的输入给中国文学的现代性转化提供了极大的营养,在启蒙主义的架构之下,中国文学从观念到形式发生了一系列的革故鼎新。这些变革和来自中国文化内部的非对抗性创造性融合一起,塑就了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之路。

中国现代文学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可能会以某种学说为强调、以某种思潮为主流,而总体生态上它是在多种文化、多种历史因素共同作用之下而发生的,对任何单一的因素的强调都无法解释现代文学所表现出的复杂形态。正是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种因素的融会交合,传播媒介、作家群体、读者群体、文学观念、文体结构、汉语言、审美观念等层面的现代性转换,成就了“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性特征。但是长期以来,由于“二元对立”的或者说“一元论”的文学价值观对史学研究的影响,学界对20世纪文学生态的梳理有很多遮蔽。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随着文化界现代性反思的展开,许多蕴涵着“历史感”和“现实感”的文学资源开始被重新“发现”。90年代以来,价值重建和文学史重构以文化—文学的“现代转型”作为理论核心,试图打通“近代”、“现代”和“当代”的条块分割,把新文学研究的起点确定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时空范畴,使20世纪

中国文学史研究获得完整的历史性标尺。在关注历史性或者说启蒙现代性的同时,把文学审美的现代化追求纳入评价体系,将雅俗文学形态拉回文学史视野,为晚清以来中国文学研究提供了共时性多元空间对象。中国文学史观念的整合与转型研究意味着破除长久形成的狭隘、封闭的“二元对立”的文学史观,确立文学研究的现代理性精神,在新的历史视野中建构现代文学史的新结构、新形态,理清中国文学现代转型的来龙去脉。当然,我们看到,中国社会现在依然是一个剧变期,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文化景观交锋冲突,中国文学依然在探寻着关怀现实与维护文学品性的未来大道。

本书在前人已有学术成果的基础上,重点探讨以下几类问题:①从宏观的视角对晚清的创作和翻译进行归纳,尽力还原和探索作为20世纪初中国文学从古典向现代转型过程中的文化因缘;②对清末民初文学无论艺术上或是精神上的丰富性、多元性作出更为合理的阐释,并对一些推动了这一文学潮流的关键人物,如苏曼殊等进行细致研究;③以“京派”及其他作家为例,通过对文学现代性发生的探求,探索中国现代化多元尝试的路径,呈现中国知识分子在从传统人士向现代知识分子过渡中文化身份的宿命承担;④对新时期以来文学发展思潮与流变以及其文化动因作出自己的判断和辨析,探究小说文本在人文精神重建中的参与意识;⑤对20世纪末21世纪初文化生态与小说转型进行观照,特别是运用前沿性的生态批评理论对世纪之交的生态小说进行研究,以期获得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整体形态比较全面的认识。

借此拙作出版的机会,我怀抱感恩之心向我的历任导师深深鞠躬。几年来,他们的鼓励、策勉伴随着我学术探索的每一步,使不敏之人不敢辍于前行。

该课题进行的过程中,部分成果以论文的形式在《文学评论》、《文艺理论与批评》、《中国比较文学》、《文艺争鸣》、《中州学刊》、《山东社会科学》、《郑州大学学报》等一些核心期刊上发表,如

今这些文章经过详细修改重新融入课题的整体构架,在这里,我要向那些在我学术追索的小径上给予我关心、帮助的编辑们致以崇高敬意。拙著引用了不少前人和时贤的有关论著,在此一并致谢。这本书的写作前后历经数载,其间我对某些问题的思考未曾间断,我有意让那些思索的痕迹遗留在文字间,由于能力有限,不少问题未能充分展开,不足之处愿读者能批评指正。

此书能得以出版要感谢原郑州大学文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张鸿声教授和河南人民出版社王卫国先生,他们为此付出了诸多辛勤工作;诚挚感谢主要由“河南省社科联成果出版资助基金”所提供的出版资助;感谢郑州大学文学院古典文献学博士点及河南省普通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原文化资源与发展研究中心提供的课题资助,他们的热情相助使得这本书没有错失这次出版机遇。

2008年2月于郑州大学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章 清末民初文学风景带——现代性的开蒙	1
第一节 “开启民智”与20世纪初小说变革	1
第二节 鸳鸯蝴蝶派:都市之“娱”与劝世之“寓”	8
第三节 通俗文学的传统“体贴”与现代“抚慰”	23
第四节 启蒙落潮与文体选择	32
第五节 现代文学发展与传媒业之关系	36
第六节 民初哀情小说:爱情的“发现”与意义重估	42
第七节 “清末民初研究热”的文化反思	52
第二章 寻绎新文学的精神资源——以苏曼殊为中心	61
第一节 20世纪初启蒙语境下的审美初创	61
第二节 苏曼殊思想新论	88
第三节 对“意译”末流的抵制与晚清译学思想	97
第四节 苏曼殊印度文学译介与文化启蒙	105
第五节 寻绎新文学的精神资源	112
第六节 苏曼殊与鸳鸯蝴蝶派	122
第七节 文本“自叙性”及其过渡性史学意义	131
第八节 新文学悲剧意识的生成与苏曼殊	141

第三章 启蒙的回响与自由的困境 ·····	151
第一节 卓异之旗:京派的缘起 ·····	151
第二节 京派的民族想象及人文意义·····	159
第三节 “现代性”的另一条阐释途径 ·····	167
第四节 通俗性、现代性与文化综合 ·····	177
第五节 知识者的“自我”找寻 ·····	184
第六节 民间文学中“反智主义”故事类型的文化生成 ···	188
第四章 新时期文化流俗与精神守望 ·····	202
第一节 新时期文学景观中的“中原突围”(上) ·····	202
第二节 新时期文学景观中的“中原突围”(中) ·····	211
第三节 新时期文学景观中的“中原突围”(下) ·····	229
第四节 20世纪80—90年代历史小说创作 ·····	243
第五节 司绮纹:一株妩媚而狰狞的“罌粟花” ·····	250
第六节 都市流俗与精神守望·····	258
第五章 世纪之交文化生态与小说转型 ·····	265
第一节 呼唤批判与审美的双重力量 ——新世纪小说“城市异乡者”书写问题谈 ···	265
第二节 大众文化语境下的“华丽转身” ——以刘震云《我叫刘跃进》为例 ·····	275
第三节 宗教文化的“返魅”与新世纪乡土小说 ·····	284
第四节 从生态角度论阿来、迟子建乡土叙事的异同 ·····	299
第五节 “万物有灵”:萨满教文化乡土小说的生态学 阐释 ·····	316
第六节 生态文学“社会发展观批判”主题辨析 ·····	329
参考书目 ·····	344

第一章

清末民初文学风景带——现代性的开蒙

第一节 “开启民智”与20世纪初小说变革

从清末到辛亥革命的历次政治思潮,是以“开启民智”、酝酿推翻专制主义统治的思想解放为先决条件的。“开启民智”的启蒙运动的各种尝试努力就是五四文学启蒙运动的一次预演,不仅推动着政治斗争的开展,而且推动着20世纪初文学的革故鼎新。

“开启民智”的目的使启蒙者选择小说作为最主要的启蒙工具,小说从文学文体的边缘成为文体中心。在梁启超“开启民智”的新小说运动以前,说部在中国文艺价值规约中实在是文人之末技,即便“降而为小说”,也绝不是作为一种堂而皇之的生计方式或事业追求。虽然晚清“小说界革命”“醉翁之意”在于文学与政治联姻,但却极力提高了小说和小说家的文场地位。中国在清末历经战败后,起始感到武器的不如人,后来感到政治上进而又看到教育上、学术上都不如人,于是有“维新派”以政治上及文化上之革新为号召。维新运动实际上是一批具有初步的现代头脑的知识分子削足适履、借助皇权这个符合中国传统伦理的冠冕堂皇的招牌企图达到改良社会之目的的一次变革。虽然康有为、梁启超在倡导废科举、开学校、育人才

时是把其作为政治方面的“变法之本”^①，其实这也是文艺上的求变之本。正是有了新教育，才培养了一批新式的文人学士，他们自觉不自觉地背离传统小说的写作路子，于是出现了学习西方新的表现形式和技巧的现代小说，但此时毕竟是凤毛麟角。变法失利，康有为、梁启超逃难日本。真正处身西方科技、政治、文化中，梁启超认识到要使中国立足于世界强国之林，只改良政体是无效的，必须“开启民智”、实行“群治”。梁启超从此告别今文经学的苑囿，转向了思想文化方面的启蒙宣传。他和他的追随者们创报刊、兴教育，极力呼吁，广泛发动，企图以此“开启民智”。而实际上这种由梁启超推出的文白参半的“报章体”构成了新思想传播的语言载体与接受者知识层次之间的矛盾，之后，由于对小说在西方社会“移风易俗”的作用的夸大，报章体政论文转向“利俗”的、“婉辟曲喻”的、“浅而易解，乐而多趣”的小说。小说在此前是不配登临文学之大雅盛殿的，公然肯定小说社会功用价值的更是没有。阿英在《晚清小说史》中认为1897年的严复、夏曾佑的《国闻报·本馆附印说部缘起》“是阐明小说价值的第一篇文字”。自梁启超把小说誉为“文学之上乘”始，在新文学中小说开始被作为中心文体而推崇，小说被视为开通民智的津梁、涵养民德之必需，以之输入“国家思想”，形成一代政治家、小说家以小说为启蒙工具的自觉意识。如“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②，“其入人之深，行世之远，几几出于经史之上，而天下之人心风俗，随不免为说部所持”^③，“欲谋开吾民之智慧，诚不可不于此加之意也”^④。也有反对提倡说部者，如“小说为振民智之一巨端，立意既歧，则为害深”^⑤。无论提倡还是反对，均从小说感人至深之功效

① 梁启超：《变法通议·论变法不知本原之害》，《时务报》第三册。

② 饮冰：《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新小说》第一号。

③ 几道、别士：《本馆附印说部缘起》，《国闻报》1897年10月16日至11月18日。

④ 邱炜爰：《小说与民智关系》，《挥麈拾遗》。

⑤ 衡南劫火仙：《小说之势力》，《清议报》第六十八册。

立论。可见,小说成为整个 20 世纪文学最发达的文体,不得不归功于世纪初把小说推为文体中心的“小说界革命”。

“开启民智”的工具论文学观,在关注文学与历史的同构作用时,启动了文学界对于小说内部规律和理论内涵的探讨。在“三界革命”之始,人们是从文学体裁的外部规律认识小说的;从“小说界革命”始,才真正蕴涵着他们对小说内部规律的探讨和理论内涵更深刻的见解。梁启超在 1903 年《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中明确指出,小说应该达到的四种功能是“熏、浸、刺、提”。这是 20 世纪最早的对于小说理论比较透彻的探讨。别士的《小说原理》分析作小说之“五易五难”：“写小人、小事、贫贱、实事、易事易；写君子、大事、富贵、假事、议论难”，“作小说者，不可不知此五难而先避之”^①。还有论小说可以“责、刺、疯、喻”^②的，这些都从不同侧面论述了小说的理论内涵和创作的内部规律。在文体上，这一时期长篇小说开始向短篇小说转换。短篇小说传播新思想更为迅速，而且作为传媒中介的报刊更适宜短篇体裁的文章，因此，许多刊物愿意征用短篇小说。《月月小说》1908 年的《征文广告》上写道：“如有思想新奇之短篇说部，愿交本社刊行者，本社当报以相当之利益。”^③在翻译理论上，大部分文章认为我国小说起笔平淡无奇，应该学习泰西小说“凭空落墨，恍如奇峰突兀”^④的开局气势。更有根据“西洋小说分类甚精”的情况，指出中国小说类型太过单调，仅可约举“诲淫海盗”^⑤的“英雄、男女、鬼神三大派”^⑥。这种对小说类型的关注比只关注小说这种“文体”更进了一步。《小说林》更把小说细致具体地划分为“历史小

① 别士：《小说原理》，《绣像小说》第三期。

② 浴血生：《小说丛话》，《新小说》第八号。

③ 月月小说编译部：《征文广告》，《月月小说》1908 年第 3 期。

④ 知新事主人：《毒蛇圈·译者识语》，《新小说》第八号。

⑤ 梁启超：《变法通议·论幼学》，《时务报》第八册。

⑥ 侠人：《小说丛话》，《新小说》第十三号。

说、地理小说……滑稽小说”^①等十二类，每一类小说的内容风格都有论及。这些理论，现在看来是非常初步的，但在当时，已经是开启先河的文事。

“开启民智”要求新的便于“唤醒和拯救”的语言表达形式，这是对旧文学诗文韵雅的强劲反拨，导致了新型语言观念的形成。“开启民智”是以启蒙性为旨的，要求对于民众的召唤力，所以“开启民智”的新小说不再推崇典雅，不再追求颐情养性，而是要求文字适合于普通国民认读，这就促使文学语言的“白话化”，并为五四时期进一步通俗化发展在理论和实践上探索了新路子。梁启超认为，古代统治阶级用科举制度大力推广“五经四书”，但《水浒传》、《三国演义》、《红楼梦》等小说的读者远远多于经书，就是因为这些小说是用“俗语”写成的。小说原出自民间，它的固有特征即是“俗”。“白话体，此体可谓小说之正宗。……欲通俗逮下，则非白话不能也。”^②所以，文学家多从民众的需要和接受力探讨小说语言的规律，当时的许多报刊杂志都以文章的“易传不易传”作为刊用标准：“书中所用之语言文字，必为此种人所行用，则其书易传。其语言文字为此族人所不行者，则其书不传。”^③从另一方面来说，为了影响民心、改良群治，小说家不得不使用粗人看得懂听得进的“白话”；而且提倡白话小说者，在其内心未必真的看重或看得起白话小说，只不过是把小说当做古时的“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文章”来做；他们的知识结构也决定了他们做不好白话小说，所以当时的白话小说显得粗浅俗陋。

“开启民智”对于小说的工具性要求、对培养国民积极进取的精神和豪迈阳刚的气质的努力，引导近代思想史上人的价值观念的转换、新旧人格理想的更替，进而导致了政治落潮后人们对政治文学的

① 小说林社：《谨告小说林社最近之趣意》，《车中美人》，《小说林》社版，1905年。

② 管达如：《说小说》，《小说月报》第三卷第五、第七至十一号。

③ 几道、别士：《本馆附印说部缘起》，《国闻报》1897年10月16日至11月18日。

厌倦,娱乐消遣文学观作为对它的反拨迅速走强。梁启超之所以用“革命”二字来指称文学变革,目的不只在表达反叛传统认识、力求使小说成为文体之正宗的强劲姿态,而且也要求小说之“魂”的改变。那个时代文学风尚的理想是英雄主题、尚武小说,许多关注小说之工具作用的文人、政客,多认为中国以往文学“言情谈故刺时志怪者,架栋汗牛”^①，“儿女气多,风云气少”，提倡把“描写才子佳人旖旎冶游之情”的小说主题改为“好武喜功,宏扬拓边开衅……刚毅气旺,具丈夫态度”^②的小说主题。梁启超甚至把中国国力上的弱败归罪于优雅裕如、总是吟咏征旅之苦的中国古典诗词,“四面楚歌”当然让人垂首失志;小说戏剧更多靡靡之音,令人气夺神丧。这种对小说主题的改造、对阳刚之美的追求,是“开启民智”的思想对于文学观念的转变所产生的作用。“从文学革新运动起,文学的转型发展便与进化论的历史观、文化观结合在一起了。”^③新式学堂的创办和外派留学生,东渐的西学带来了新型的教育内容、方式,人文主义思潮的传入,培养了一批具有自主意识的新型知识分子,他们主张新的小说不为流经传史,而为培养国民积极进取的精神和豪迈阳刚的气质。我们完全有理由说,这些源于“开启民智”的小说创作思想是近代思想史上人的价值观念转换、新旧人格理想更替的肇始。梁启超以小说“改良群治”,与五四时期文学研究会“文学为人生”的文学观一脉相承。不过,我们应该看到,清末民初的文学不得不向下看齐,但除了那些具有“政治化”口味的读者,“政治化”的小说毕竟被视为“高雅的、神圣的”东西,启蒙主义所希望的人的解放、个人主义的历史效果要求一种共谋性,这种共谋性反过来限制了文学的个性化发展。

① 周树人:《月界旅行·辨言》,《月界旅行》,日本东京进化社1903年版。

② 饮冰:《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新小说》第一号。

③ 孔范今:《走出历史的峡谷》,山东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

反过来说,正是清末对小说“开启民智”的乌托邦式的追求,促成了个人价值观念的变更,从而促使文学在觉醒后逃离政治目的的中心漩涡,回到小说的原旨意义上去。早在梁启超等力倡政治小说之前,就已经有了迎合现代市民欣赏趣味、立意不在“开启民智”的通俗小说。第一次启蒙运动受挫后,辛亥革命爆发,它立意实现民族革命的“统合性”,这就要求知识分子把目光从西方文学的“救世神话”上拉回到中国现实。辛亥革命在救国方略上迥异于启蒙立场,但革命文学依然关注国民的思想变革,依然要求文学的阳刚之气。20世纪第一个文学社团“南社”成立,大量的激昂慷慨的热血诗文现于报端。但辛亥革命胜而无果,革命落潮了,曾经高涨过的社会政治热情迅速减退,文学表现出对政治的彻底失望和自行疏离,“娱乐消遣”的文学观迅速替代了“开启民智”的载道观。这一转化与文学商品化、文人职业化以及市民读者阶层的形成有关,与文人对政治的失望有关,也与政治文学的“启蒙性”所提倡的对“俗化”的倾情有关。启蒙文学为自己培养了终结者。从通俗文学的价值立场上看,正是启蒙的落潮才使文学走出了“文以载道”的价值观念,并走上文学另一种意义的诉求。民初的小说反对的就是“有似正史”、政治功利的小说观,明确提出“小说者……或曰茶余酒后之消遣品而已,若夫补救人心,启发知识之巨任,非所责于小说也”^①。这种以读者市场为导向的创作方式与清末的新小说和五四型的个性启蒙小说创作不可同日而语:一种是天下救亡意识,一种是市场意识;一种导向革命,一种导向现代性的生活消费。这些被随后的文坛戏称为“鸳鸯蝴蝶派”的作家最初多是南社革命作家,他们对时代的触摸从形而上的家国关怀转向形而下的生存现实抚慰,从社群之家的文学载道转向个人之家的文学自慰。小说暂时逃离了“开启民智”的桎梏,转向对现代城市平民日常生活文化的关注。

^① 钝根:《小说丛刊·序》,《小说丛刊》,江南印刷厂1914年版。

清末对小说“开启民智”的乌托邦式追求,促使民初小说在觉醒后回到“调情适性”甚至“艳情感人”的意义上;但这绝不是重复的回旋,无论在伦理价值观念的突破还是文学表现人生的意义上,20世纪初期的通俗小说与传统小说相比都有着质的飞跃。一种文学形式总是一种历史情境下文学话语权力的体现,文学有时不得不与历史期待同流合污;而无论是新文学还是通俗文学,无论是主流文学还是弱势文学,它们都会体现出与历史的同构性,通俗文学如“鸳鸯蝴蝶派”小说也是一种与历史同构的方式,只是同构的价值维度与启蒙文学和革命文学不同而已,它更重视民众特别是市民的日常生活现状。以往的20世纪文学经络图上缺少市民文学这条线索,除了中国都市成长缓慢且影响面小外,重要的是中国的贫弱使文学无法卸掉传统文学观念中“文以载道”的重任。人们对20世纪文学的历史价值、工具理性的单向度诉求,把古与今、旧与新、进步与落后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视为文学研究的基本模式甚至唯一模式,从而忽略了文化—文学中多重价值范畴和多重文学形态的实际存在。当前中国文学史观念的整合与转型研究意味着破除长久形成的狭隘、封闭的“二元对立”的文学史观,确立文学研究的现代理性精神,消除文学史研究从结构形态到话语方式上依然存在的“整体叙事”的元话语性质和意识形态叙述形成的线型结构造成的现代文学研究中的诸多“盲点”,从而在新的历史视野中建构现代文学史的新结构、新形态,使许多曾经在中国文学现代转型的发展过程中影响深远的“非主流”作家和流派进入文学史的“结构性存在”之中。

一种文化是一个有普遍性和连续性的完整的生命。因其普遍性,它成弥漫一时的风气;因其连续性,它为一脉相承的传统。每个时代的作家都是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交接者,但是并不是每一代作家都可以成为文学史流变中真正意义上吐故纳新、“过渡的一代”。清末民初从“政治小说”到鸳鸯蝴蝶派小说,这一代文人对于文学史的意义并不在于他们贡献了多少不朽的经典巨著,而在于承接和变革